

《滕学义建祠碑》考释

梁勇

(徐州市博物馆 江苏徐州 221002)

姜新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江苏徐州 221002)

This is a detailed intouduce about tablet of TENG Xue-yi Building Temple written within Guangxu reign of Qing dynsyty. The record of this table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of Huai Army and rebel force named Nian Army.

Key words: tablet of TENG Xue-yi Building Temple Huai Army Nian Army

内容提要 光绪年间所立的《滕学义建祠碑》，所记史实是研究淮军及捻军起义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 《滕学义建祠碑》 淮军 捻军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1989年10月，中国江苏省徐州市风化街(旧称凤凰街)旧城改造拆迁房屋时，发现光绪乙未年(1895年)所立滕学义建祠碑一块，因碑原存于夹壁墙中，故碑身、碑座均保存完好，现藏徐州博物馆。

该碑青石质地，碑身长2.6、宽0.73、厚0.28米，碑座长0.81、宽0.62、厚0.35~0.4米。碑身四周饰万字连续考图案，碑额书“圣旨”二字、字两边为海山云龙纹，字上为火珠，碑文正楷，22行，满行85字，全文共1295字，叙述了清记名提督(即提督军门)滕学义的简历及清政府为其建祠的经过，碑中所记史实是研究淮军及捻军起义的宝贵资料。

滕学义，字宜亭，安徽和州含山人，幼入淮军，先随淮军名将刘铭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清军攻常州、夺广德立下了汗马功劳，由守备升为都司，又从都司升为游击。太平天国失败后，滕又跟随刘铭传剿灭捻军，转战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

地，由游击升为总兵。同治六年(1868年)“遂以记名提督用锡巴图鲁勇号。”同治十一年“调赴徐州巡防邳、宿、睢、沐四州县”^[1]，同治十三年三月滕学义卒于宿迁防所。滕学义在剿捻中的表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中多有记载。

光绪十八年(1892年)前后，清朝兴起一股立祠热，滕学义也获此殊荣，“追予故统带淮军武毅左军、记名提督滕学义于徐州地方建立专祠，从两江总督刘坤一请也”^[2]。清季设徐州府，府治在今徐州市，所属州县有8个，即丰、沛、肖、砀、铜、邳、宿迁、睢宁。故滕“卒于宿迁防所”，专祠却建在徐州。淮军将领吴宏洛、程孔德、陈凤楼、刘盛休、何迪华等都出资相助，光绪乙未年，滕学义专祠建成。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最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更成为全国反清的主力。捻军驰聘征战，先斩僧格林沁于高楼寨，粉碎了清军

收稿日期 1999-08-10

作者简介 梁勇(1959年8月生)，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博物馆，副研究员。

姜新(1952年10月生)，男，北京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穷追猛赶”的战略；后败曾国藩于苏豫皖之间，突破清军“画河为牢”的计划。然而，捻军终于在李鸿章指挥的围剿中失败，未能冲破“扼地兜剿，蹙之海隅”的布置。1867年东捻困灭于黄海之滨，1868年西捻重蹈覆辙，败亡于渤海之畔。李鸿章也由此声威大振，奠定了封爵拜相的又一阶梯。为此人们对“扼地兜剿，蹙之海隅”战略颇为重视，但是至今对谁是这一战略的最早提出者，尚无定论，本文试图利用《滕学义建祠碑》中的新材料，发表管见，求正于史界同仁。

“蹙之海隅”战略谁是始作俑者？不少人认定是李鸿章，这并非没有根据。同治六年六月，他向清廷建议：“先布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13]。以后，他又为这一战略拼命辩护，他向曾国藩保证：“既断，既期於必成矣”^[14]。他同曾国藩争论，表示对此战略“死不肯舍，犹公当年不退金陵也”^[15]。他坚决反对丁宝楨的追剿战略“惟任、赖各股粤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剿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事……”，主张“必先能堵，而后能剿也”^[16]。他始终坚持这一战略，直至东捻失败，接着他又故伎重演，再以这一战略剿灭西捻。

但是，这些根据只证明李鸿章是这一战略的支持者、实行者，并不能证明他是发明者。

有的论者认为李鸿章“袭用曾国藩的战略”^[17]，这也有一定道理。曾国藩的“画河为牢”、“四镇六流”与“扼地兜剿，蹙之海隅”，两者之间确有相似之处。两者的战略意图，都是根据地势建立巩固防线，先围困捻军，再进攻消灭之。曾国藩称之为“以静制动”，李鸿章称之为“先堵后剿”。尽管李鸿章自诩自己采取的战略学自明将孙传庭，可私下里他也承认：“曾侯接办，初拟四镇六流之议，控扼豫东皖北形势，似为得之实，则主守而甚战，以东南攻守之师，处平原散漫之地，当万骑剽狡之贼，舍此亦无下手处”^[18]。他表示自己将采取类似的战略，并承认自己在剿捻战略上受到老师的启发和影响。

但是“画河为牢，四镇六流”与“扼地兜剿，蹙之海隅”两战略，还是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别，其关键在于：“蹙之海隅”同“四镇六流”的战略实施不同。所谓“四镇六流”的布置大致是：在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口四地驻扎重兵，在运河、沙河、贾鲁河、黄河、淮河严密布防，构成一座牢笼，困捻军于核心。所谓“蹙之海隅”则是将捻军引入胶东半岛，然后以胶莱河为第一道防线，运河为第二道防线，北面以黄河为防线，南面以六塘河为防线，

东南、东北及正东部都以大海为天然屏障，以完成“扼地兜剿”的意图。对比之下，后一种战略更符合实际。第一，两者之间存在着四面设防与坚守三面之分，前者战线漫长，兵力分散，精锐的铭军等不但自己设防，而且要代豫军修壕，无力对捻军以有力地打击。“蹙之海隅”依靠登、莱三面环海的地形，防线大大缩短，有可能层层封锁，集中兵力设防，抽调精锐进击。第二，两者圈划的战场地形不同。“四镇六流”所圈划的战场地处平原，历来是“四战之地”，尤其骑兵可“云翔风驰”，便于捻军活动。“蹙之海隅”所圈划的战场“三面距海，河渠环错，山径崎岖，马贼无可驰骋”^[19]不利捻军活动。第三，两者之间有“糜烂数省”与“糜烂一省”之分，后来容易得到各方支持。“四镇六流”希望困捻军于苏、鲁、豫、皖四省之内，这便同有守土之责的疆臣大吏的“以邻为壑”愿望大相径庭，于是他们离心离德，阳奉阴违。战争中，“河南不愿办沙河、贾鲁河之防”^[10]，铭军与豫军内讧都有明显事例。而“蹙之海隅”计划困捻军于山东一省，几条防线恰恰可以防止捻军进入其他各省，这是各省督抚求之不得的。因此尽管山东巡抚丁宝楨反对，但其他省均表示支持，出兵出饷帮忙助战，一度出“皖、豫、曹鄂各疆臣通力合作”^[11]的局面。正是由于曾国藩战略的短处，他失败了，沙河、贾鲁河防线先溃，运河防线后垮，曾国藩被李鸿章取代，而“蹙之海隅”战略为李鸿章取得了胜利^[12]。由此可见，“扼地兜剿，蹙之海隅”战略方针发明权不应归于曾国藩。

那么这一战略方针到底是谁提出的呢？许多材料表明是刘铭传向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湘军志·平捻篇》记载：“（1867年）五月，……东捻分掠宁阳、莱芜，刘铭传议蹙之海隅，悉征诸军会青、莱、莒，驱捻入登、莱。捻避山东军，直东趋平度、莱阳、招远；鸿章乃议守胶莱河”^[13]。曾国藩也曾说：“此次胶莱守局，贵军门（刘铭传）首创此议，朝廷主之，众论随之，畿辅及齐、豫、皖、鄂各省之师亦皆踊跃用命，气机甚属凑泊，或者天时人事，竟有灭贼之机亦不负军门一番苦心也”^[14]。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向朝廷汇报“蹙之海隅”战略时说：“刘铭传、潘鼎新向有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制贼奔窜，徐图聚歼之议，此次复申前说，……往来追蹙蹙海隅而上等语”^[15]。同年六月，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说得更明确：“倒守运河之议先未敢决，省（刘铭传）、琴（潘鼎新）各三函力劝，省三（刘铭传）且以去就争，西林（潘鼎新）来书愿率全军以从，不得已而定计……”^[16]。当时前线后方的统帅李鸿章、曾国藩都

明确地承认“蹙之海隅”之计不是自己所创,而且不约而同地指出最早向他们建议这一战略的是刘铭传,要求执行此战略最坚决的还是刘铭传。这样,刘铭传是这一战略首创人,似乎已成定论,但“滕学义建祠碑”又提出了新的疑问。

三

“滕学义建祠碑”碑文记:“(滕学义)六年调山东,时捻匪张总愚,任柱两股蹂躏齐鲁,土地糜烂。公(滕学义)建议曰:‘登、莱陡入大海,绝地也,如能三面兜剿,蹴贼其间,一鼓可灭矣。’六年,大府卒用公言,直东肃清,红旗奏捷,公遂以记名提督用锡巴图鲁勇号。”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于“蹙之海隅”战略,碑文记载了三点,第一,滕学义首倡这一战略;第二,滕学义的建议得到上级的采纳;第三,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我们认为这些记载是基本可靠的。

碑文所记“三面兜剿,蹙之海隅”的建议与清军实行的“扼地兜剿,蹙之海隅”战略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具体实施剿捻战略的李鸿章曾对这一战略进行了具体说明:“三路兜剿,欲逼入登、莱绝地,会合东军相机扼堵,如能扼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臣抽调运防各军,轮往替扎,更番进击,如各军尚未到齐,或布扎未定而贼已回窜……臣督运防各军随地堵截,不使之遽窜运西,仍须蹙入海隅,乃有歼贼一日。……故臣必先布运防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17]。清军战略要点有三,一是驱,诱迫捻军进入登莱海隅绝地。二是蹙,封锁捻军于登莱海隅绝地。三是剿,在捻军活动范围缩小的情况下,剿灭捻军。这同碑文所记建议的要点重合,而且具体的兜剿方向,海隅地点的选择也完全一致。

不同的是碑文所记建议并未具体指明蹙之海隅的防线,只可隐约看出滕学义希望设防于胶莱河一线,而清军实施过程中又增设运河防线。由于捻军最后败于倒守运河之东的包围圈中,所以倒守运河之策,倍受青睐,清廷大赏防河有功人员,帮闲文人为此大肆吹捧,淮军将领为此洋洋自得,而与倒守运河紧密相关的“扼守胶莱”,则受到另一番待遇。清廷以“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下令“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楨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薄惩”^[18]。李鸿章等人在以后日子里也很少提及。事实证明,将两条防线分隔开来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胶莱防线的激战,清军就不可能取得运河之东的胜利,两者都是贯彻蹙之海隅这一关键不可缺少的环节。1867年6月东捻军进入登莱地区,被

清军两道防线挡住西去道路。捻军多次冲击胶莱防线,虽然侥幸突破胶莱防线,但损失惨重,这一仗成为捻军迅速走向败亡的转折,勇敢善战的捻军战斗力急剧下降,清军将领刘铭传感到捻军不象以往“人欢马叫”,捻军统帅赖文光自称:“今予军心自乱”^[19]。捻军不仅再无力冲破运河防线,而且连战皆败,11月任化邦被害于赣榆,12月范汝增战死于寿昌,次年1月赖文光被俘于扬州,转战数年的捻军,在突破胶莱防线四个月,全军覆没。如果我们不被历史上对“倒守运河之策”的赞扬和对“胶莱防线的攻讦所迷惑,不割裂完整的“扼地兜剿”战略,不忽视“蹙之海隅”这一整个战略的核心思想的话,不难看出滕学义的建议,就是刘铭传的建议以及李鸿章兵力布置的雏形。

碑文记载滕学义是“蹙之海隅”战略的首倡者,这是完全可能的。如前所述,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比较切合实际,战略的提出者必须对捻军的特点,对当时战争的情况有比较深刻地了解。滕学义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条件。1865年随淮军第一批剿捻部队,开赴剿捻前线,先后在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等地与捻军对抗,是淮军中与捻军交手最早、作战最多的将领之一。他不仅象同伙刘盛休、陈凤楼那样凶狠,而且时常表现出善于谋略的特点,黄安战役,他率兵四营包抄捻军背后,扭转了战役局面^[20]。松树山激战,他伙同刘盛休偷袭捻军,截断捻军各部之间联系,致使捻军一日三败^[21]。赣榆战役,又是他由城北绕出城,乘大雾突击捻军后路。正是由于这些“出色表现”,他从游击、免补参将而升为副将,接着又晋秩总兵,以后又升记名提督,由四品官很快便戴上了二品顶戴,长期而频繁的对捻作战,无疑增加了他对捻军的认识,引起了他对战争策略的思考,因此,由他提出一个较为符合实际的战略是合情合理的。

碑文“大府卒用其言”中的“大府”当是指李鸿章,但在李留下的文字中并没有对此事的记载,《清史稿》、《淮军平捻记》等史籍虽提及滕学义其人,但也没有他首创此议的文字,这如何解释呢?就资格而言,滕学义并非剿捻的决策人物。史籍所记的大的战略方针,忽略地位较低的首创者,仅记载决策人物的决策过程是常有的。再者,滕学义当时仅为副将,直接向督抚建言的机会不多,据常理其建议应由与李鸿章关系更亲密或地位更高的人转达。滕学义是刘铭传麾下爱将,他们一道攻常州,克广德,守济宁,战尹隆,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转战到镇压捻军的战场,可谓“患难之交”。滕

有何建议想法,自然首先告知顶头上司刘铭传。刘铭传则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自从淮军建立便追随李鸿章帐下,不但冲锋陷阵,而且时常出谋划策,显然,刘铭传便成为转告滕学义建议可能性最大的人选。大量史料恰恰证明,此战略的直接建议者正是刘铭传。因此,滕学义在1867年初尹隆河铭军惨败之后,建议改变战略,从“画河为牢”变为“蹙之海隅”,刘铭传立即同意并转而向李鸿章建议,1867年5~6月李鸿章决心采取这一战略,上奏清廷批准实施,这就是“蹙之海隅”战略合乎逻辑的决策过程。

四

人们或许要问,会不会为滕学义立碑之人,贪刘铭传之功为滕学义所有呢?我们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小。

第一,为滕建祠之事,是由滕之旧部戴钧衡、陈善甫等人禀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奏请清政府,清政府以上谕形式批准的。碑文载:“天子览疏震悼,命礼臣议优恤……兼谕原籍及立功死事地方各建专祠,春秋官为致祭。”《清实录》中也记此事:“(光绪十八年五月)追予故统带淮军武毅左军记名提督滕学义于徐州地方建立专祠。”建祠先后费时一年有余,专祠位于当时徐州主要街道凤凰街,自始至终冠冕堂皇,郑重其事。碑文中固不免溢美之词,但是,故意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是不会的,尤其对剿捻战略这样的重大问题,公开作假更不可能。清代对专祠的审查还是比较慎重的,因溢美过分而遭严厉处分的先例是有的。为滕立碑之人,决不会为吹捧死者,而甘愿犯欺君之罪。

第二,立祠之时,李鸿章官拜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炙手可热。刘铭传虽已离台湾巡抚职,人仍健在,宠幸未衰,清廷正准备再次起用。立祠撰文者决不敢贪活人之功为死人之有,从而开罪大权在握的重臣。

第三,为滕学义建祠立碑者,与滕有各种关联,但同李鸿章、刘铭传有着更深、更亲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建祠立碑赞助者的名单,作进一步的考察。其中,江苏提督陈凤楼,署徐州镇总兵程孔德等都是淮军铭字营初创时,便跟随刘铭传南征北战的宿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慎修与吴宏略二人。

刘慎修,遍查有关史籍未见其名,其实他不是别人,恰恰是刘铭传的侄儿,立碑时,正驻守大连

的刘盛休。理由如下:(1)刘盛休勇号法克精阿巴图鲁与碑文中刘慎修的勇号完全一致。(2)刘盛休官职为记名提督,这一职务在清代仅为虚职名号,往往被人们尊称为“提督军门”,这也与碑刻相同。(3)清代记名提督的实授职务往往是总兵。光绪二十年(立碑后一年)西太后对各地官吏降旨加恩,明确记载:“赏河南河北总兵刘盛休双眼花翎”^[22]。再查此前此后,“河南河北总兵”并无开革调动之举,而刘盛休的实职又与碑刻中刘慎修的实职重合。(4)湘军、淮军诸将视军队为私产,一向以亲谊为联系纽带。铭军尤为突出。《淮军志》评述:“诸将更私其军,各私其部曲,鸿章亦尊重诸将意见。如铭军必以刘氏一姓接统,所以除唐定奎以外,刘盛藻、刘盛休统铭军颇久”^[23]。《异辞录》记载的更为清楚:“刘壮肃公(刘铭传)曾与文忠要约:继为统帅者,必以刘氏子弟,是时(指光绪十九年)刘盛休为将”^[23]。以上史料不仅指出铭军的私军传统,而且记述了刘盛休统领铭军的事实,更明确了其为将的时间,正巧是建祠立碑之年。而在其他记载中,没有发现叫刘慎修的将领,也找不到刘铭传族中有叫此名的子弟。因此,以“总统铭字水陆马步全军河南河北总镇法克精阿巴图鲁”名义捐款的刘慎修,就是当时统领铭军的刘盛休。(5)刘慎修与刘盛休的读音相近,除慎(shen)与盛(sheng)两字鼻音轻重相异外,其他完全一致,合肥乡音与徐州乡音中,en与eng更是难以区别。

“头品顶戴记名提督军门统领淮军宏字营前福建澎湖总镇利勇巴图吴宏略”也非他人,而是协助刘铭传镇守台湾的重要将领吴宏洛。(1)吴宏洛的勇号与碑刻中吴宏略的一致。(2)吴宏洛从澎湖总兵设置之初,便在刘铭传的提携下任总兵。光绪十一年十月,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澎湖一岛……必须扼扎劲旅。……查记名提督吴宏洛……骁勇敢战,讲求操练,深悉外洋火器精微”^[25]。清政府同意了刘铭传的建议^[26]。吴宏洛为澎湖总兵直到光绪十九年张其光接任^[27],这样他的官职又与碑文一致。(3)尽管“洛”与“略”一“水”旁,一“田”旁写法不同,但读音“洛”(luo)与“略”(lue)却十分相近。捐款的吴宏略就是吴宏洛应属无疑。

刘盛休和吴宏洛,一个是刘铭传的侄儿,与刘铭传有叔侄之情^[28];一个是刘铭传提拔的爱将,有知遇之恩,他们当然不允许损害刘铭传,不允许将刘之功记于滕学义名下,更不会出钱赞助这样的事情。

综上所述,结合其他史料考察,滕学义专祠碑

文,其记载合乎常理,其建祠立碑者没有理由刘冠滕戴。因此,我们认为这段记载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清军采用的“扼地兜剿,蹙之海隅”的战略,为地位不是那么显赫的滕学义首倡。

[1]碑文

[2]《清宝录》光绪十八年五月,华联出版社1964年。

[3][6][9][11][15][17]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续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折·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奏折》,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4][5][8][16]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续编:《李文忠公全集·函稿·上曾相·复曾沅师·复蒋芑泉中函》,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7]范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中华书局1986年;池子华:《剿捻统帅的更迭与捻军的兴亡》,《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1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同治五年二月九日日记》,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12]曾国藩、李鸿章剿捻失败与成功的原因较为复杂,篇幅所限,这里不作深入分析。

[13]王运:《湘军志·平捻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14]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曾文正公全集·函稿·铭字营刘军门传禀分守胶莱河因贼情形》,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求阙弟子记》第2册,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20][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淮军平捻记》第1册,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22][27]王先谦等编:《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第3307页。

[23][28]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

[24]刘礼智:《异辞录》卷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25][26]刘铭传:《刘壮萧公奏议》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书店影印版。

附碑文

圣 旨

同治十有三年春三月,提督军门滕公卒于宿迁防次。天子览疏震悼,命礼臣议优恤,予祭葬入祀。京师昭忠祠荫其子弟一人以六品官用,兼谕原籍及立功死事地方各建专祠,春秋官为致祭。

天语煌煌,然后叹公之功不泯也。公姓滕氏,讳学义,安徽含山人。幼从淮军,升守备。同治三年三月间,公随前台湾巡抚刘公铭传攻常州,其守贼伪护王陈坤书抵死抗拒,月余不下。公绕城周视,见北门有隙可乘,遂麾军进攻。贼开炮轰击,中公右腿;公裹创出战,奋不顾身,我军肉搏登城,歼贼无算,府城遂克。捷闻,公擢都司,由是知名大帅。寻檄公由句容督队星夜驰赴广德,道出建平,迭获胜仗,得器械牲畜无算。及抵广德,伪昭王黄文英率其悍党百计堵御,公偕前队周盛波等进军横山头,明修营垒,潜开地道,昭逆大骇,遂于七月二十九日携其幼主洪福顶以遁。城贼犹死守,孤濡待援。公麾枪炮迭发,不逾时,贼遂反奔。迨至西门,会溧阳守将周盛传亦至南门入,城立收复,捷上,公擢游击。四年,调赴六安防堵。寻因任、赖诸捻匪猖獗,调公济宁,驻军长沟,垒未定,贼队来扑,公令坚壁勿出,迨离营近,我军奋勇迎击,逆党败遁,诸军蹙之,连克七驿,夺获龙口数面。大帅上其事,公遂以免补参将擢副将。旋奉檄赴河南驻罗山,值岁暮。五年,调赴湖北,连破黄陂、麻城二县,公晋秩总兵官。六年,调山东,时捻匪张总愚、任柱两股蹂躏齐鲁,土地糜烂。公建议曰:“登、莱陡入大海中,绝地也。如能三面兜剿,蹙贼其间,一鼓可灭矣。”六年,大府卒用公言,直东肃清,红旗奏捷,公遂以记名提督用锡巴图鲁勇号。七年,檄公防御直东二十八州县,环堵安然,秋毫无犯。九年,甘肃逆回马化龙蠢动,调赴陕西,扼守陇州,纪律严明,地方绥靖。十一年,事平,调赴徐州巡防邳、宿、睢、沐四州县。在防两年,每遇地方公事及巡哨缉匪,公率身先士卒,不辍矻矻,民赖以安,积劳成疾,旧伤复发,遂卒于宿迁防所。百姓闻公死,思之德,识与不识,莫不流涕。公身不满五尺,声若洪钟,未尝学用兵,辄中机宜。故公之卒也,今相国合肥李公有:“淮军又失一名将。”之叹云。光緒十八年,全椒何公奉檄赴徐州接中军游府篆,道出宿迁,绅耆思公之德,久而不置,攀辕呈请,乞何公转详大宪专摺奏。

闻建立专祠以彰忠荃,何公义不容辞,遂商同公旧部戴公钧衡、陈公善甫,公同稟请两江督宪刘、直隶爵阁部堂李专摺恭请。天子允其奏,择日兴工,遂建祠于徐州之凤凰街。费用不敷,赖何公之力抒巨款经营,年余始竣。至日,士民奉主入祠,官为致祭,父老观之有泣下者。呜呼,公之血食百世洵无已,虽然非何公之力任其艰不到此祠成,谨书其事如左。

头品顶戴记名提督军门统领淮军宏字营前福建澎湖总镇利勇巴图鲁吴宏略,捐银叁百两。

钦命记名堪胜提督军门统领徐防马步等营署理江南徐州总镇军功加一级程孔德,捐银貳百两。欽命提督军门统领徐防铭凤马步等营两江清淮行营营务处江南徐州总镇克勇巴图鲁陈凤楼,捐银叁百两。

头品顶戴提督军门总统铭字水陆马步全军河南河北总镇法克精阿巴图鲁刘慎修,捐银叁百两。布政使衔直隶先题奏道卓异加三级宴廷馨,捐银五拾两。补用游府官管带徐防步队右管陈景鏞,捐银叁拾两。记名简放总镇管带字左营优勇巴图鲁徐得贵,捐银叁拾两。欽加总镇管带春字前营两江补用协镇借补九江后营游府俊勇巴图鲁陈有元,捐银五拾两。两江先协镇徐州镇中营游府管带徐防新兵左营驥勇巴图鲁何迪华,捐银壹千两有奇。两江先协助镇管带淮北巡緝水师营洋河游府戴学铨,捐银五拾两。尽先参府管带武毅左军右营程孔尧,捐银叁拾两。

光緒乙未年桂月谷旦
游击衔尽先都司刘泰森
都司衔尽先守备赵康龄 监修
钦加五品衔中营传号张彦瑞